

# 现当代文学史不应无视旧体诗词

曹顺庆

现当代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有造诣的旧体诗词作者,他们的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些作品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

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排斥在“现代文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有意或无意地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身影依然难觅于这些名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之中,似乎它们并不存在。

其实在20世纪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这其中有无否定、批判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如开新诗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就创作有1400余首旧体诗词;又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郁达夫等,也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一把好手;有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如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阔达气象至今仍熠熠生辉;有学者、画家,如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旧体诗词”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些“旧体诗词”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旧体诗词缺少“现代性”这点来立论,可问题在于:倘若用以立论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百年复杂的文学生态“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依然有效呢?此外,倘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无视旧体诗词创作大量且客观存在着这一现实的话,我们何谈尊重历史、何谈学术研究的客观中正呢?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加入旧体诗词的章节,如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学科规范的确立一样,学科规范的修改以及学界共识的调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距离“旧体诗词”真正“入史”似乎依然遥远。

与之相类似的,旧体诗词在现有文化机制层面尚缺少实质有效的鼓励与支撑,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如高校教育方面,即便在中国文学专业,也罕有旧体诗词写作的教与学;又如

文学刊物方面,供旧体诗词创作者发表的空间少之又少;再如在文学评奖方面,罕有主流文学奖项将旧体诗词纳入到评选范围当中。在这样一种旧体诗词缺少“存在感”的文化生态中,当有作者因旧体诗词创作被授予主流文学奖时,舆论为之一时大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倘若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搁置一旁,我认为旧体诗词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文化主流机制对“旧体诗词”存在的接纳。这对旧体诗词、传统诗词乃至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与弘扬,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类似的鼓励和引导应该被纳入到当前文化生产与评价机制当中。

旧体诗词的尴尬境遇不是一日之寒,诗歌传统的断裂、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与认知更不是一时现象。若要是有所改善,应采取多样化手段。《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这样的节目形式当然值得褒扬推广,然而仅靠传媒远远不够;传统文化的发扬也不能只交给市场,它迫切需要在现有文学和教育机制中得以正视和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想真正地实现这一结合了鲜明时代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我们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社会当前的精神生活世界,运用多种方式让当前的文化机制起到孵化、刺激以及引导社会自觉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营造出一个对传统文化更加“懂得”与“友好”的文化大生态。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文学若要帮助人类认识自己,需要有建立在人性认识基础上的自审意识,以及危机意识、大生态意识和大爱意识

## 文学当助人识己

叶廷芳

古希腊苏格拉底在德尔斐神庙上刻下这一铭语:认识你自己。它成为千百年来人类自我觉醒的警句。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由于不能认识自己而陷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科学的关系等。人类的各种危机根源于人类自身,要克服这种危机,需从人自身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为文学是“人学”,正是追问和塑造人的灵魂的学问。

文学要帮助人类认识自己,首先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现隐藏的的东西。鲁迅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挖掘得深的本领,说他能在“罪恶深处拷问出洁白来”。同样,一个“洁白”的人拷问到最后,也可以挖出他的污秽来。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怪诞、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都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

自审意识需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若将这两种现象加以概括,就是“善恶并存”,这是人性本质。伟大诗人歌德创作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伺机使坏,诱使浮士德犯错误甚至犯罪。这个鬼事既是人类进步历史的隐喻,也是个人成长的隐喻,一个人的成长总是进取精神与消极精神相伴而行。德国马克思主义伟大戏剧家兼诗人布莱希特,也在其剧作《四川好人》中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亦好亦坏的女主人公形象。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有能耐的作家自有办法。例如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的是“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突然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不管主人公怎样东奔西突,只见包围圈日益收紧,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回这一罪过。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卡夫卡小说《地洞》中有这样一句话:“危险迟迟不来,但又时时防备着它来。”这句言简意赅,堪称现代人生活境况的写照。事关人类生存问题,文学可关注的空间很大。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20世纪20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文学家应该具有人类良知。例如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一剧一经问世,一年半之内仅在德语国家就上演了1500多场,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深层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可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地入睡了。

叶廷芳,生于1936年,祖籍浙江衢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翻译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率先译介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引起较大反响。主要学术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随笔集《美的流动》《遍寻缪斯》《废墟之美》等。



## 唱响人间大爱

——评民族歌剧《有爱就有家》

严春芳



“同有一个家/那是我的家/心中的牵挂/深深的眷恋/洒在月光下/有爱就有家/灿烂如鲜花/岁月悠悠好年华。”

由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省交响乐团联合推出的原创民族歌剧《有爱就有家》近日于湖北省歌舞剧院与观众见面。真实动人的故事、通俗贴心的歌词、技艺精湛的表演、朴实无华的舞美,以及优美悠扬的交响乐曲深深地感染了观众。《有爱就有家》以公安县麻豪口镇福利院长刘德芬敬老爱幼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以福利院这个特殊大家庭为场景,以人间大爱为主线,真实再现好人刘德芬热爱福利事业、让孤寡老人安度晚年、让弃婴健康成长的可人事迹。作品聚焦当前社会特别是农村面临的养老与抚幼等问题,讴歌了“老百姓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中华美德,以及新农村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善良民风。

创作源于生活。编剧深度发掘生活真实,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都取自生活。主角刘德芬是一名基层民政工作者,担任乡镇福利院院长30年,把青春奉献给了福利事业。在这个由老人与孤儿组成的特殊大家庭里有人肢体残障,有人性格孤僻。刘德芬视老人如亲爹亲妈,视孤儿为亲生儿女,身兼卫生员、服务员、种菜员、炊事员等职务于一身,真心、细心、耐心、用心地给予众人亲

人般的关照,帮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刘德芬舍小家为大家,最终积劳成疾,患病离世,享年63岁。她的先进事迹传遍荆楚大地,逝世后当地老百姓自发追悼,送别的人们失声痛哭。

艺术高于生活。刘德芬的扮演者,武汉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丹丽以娴熟的演技,高亢圆润的嗓音,塑造了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农村妇女形象。通过人物不知疲劳地为老人梳洗、安抚病患、洗衣做饭等日常生活情节,特别是1998年分洪期间用板车转移人财,身遭车祸还拼命保住铁锅,毅然收养残疾弃婴等场景,刘丹丽表现出人物的大孝大爱、至善至美的高尚情操。为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刘丹丽率演员们深入公安县麻豪口镇福利院,用心用情体验角色生活,与孤寡老人座谈,亲手炒菜做饭,为老人服务。扎实的生活体验使演员们能够形神兼备地表现人物,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

全剧唱白将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结合,通俗易懂又富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舞美简约大方,场景布置与人物个性和谐统一,曲终肠断,令人动容。值得一提的是,《有爱就有家》发挥专业艺术师生与地方专业演员协作优势,凝聚民族歌剧创作有生力量,为探索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新模式提供了有益经验。

(上图为《有爱就有家》剧照)

导向”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不仅“美”如此,“真”和“善”也是如此,“真”涉及认识问题,“善”涉及道德问题。在一个大转型时代,传统道德、新道德,中国道德、西方道德,公共道德、私人道德,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体系混杂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有能力争夺“善”的定义权。

说到底,“真”“善”“美”背后有多种力量在博弈,好莱坞在塑造着他们的真善美,日本、法国也在塑造着他们的真善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表现和定义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真善美,如何发现“真”“善”“美”之间的矛盾并做出我们的回答。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主旋律文艺作品探索的应有之义。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日益发达,这对主旋律作品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需要打破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在新时代以开阔的心胸不断拓展主旋律边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对我们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缺少足够的自信。如今,这样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正在变得从容自信。这样的从容自信是林则徐、魏源一代所没有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一代所没有的,也是鲁迅、胡适一代所没有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巨大转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还需要以艺术的方式传播中国人的价值观,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主旋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主旋律”,必将解放艺术生产力,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

完成这一时代任务,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感观等各方面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需对近代以来构成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清理,这将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值得欣慰的是,伟大的实践让我们在当代时代迎来伟大的历史转折,赋予我们更加充沛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较比从前,我们可以自信地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系统地整理历史,从容地把握未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在一个新时代,自信地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善美,用我们的力量与美奏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李云雷

## 让「主旋律」之路越走越宽

“主旋律”是指一切宣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主旋律”却往往被窄化。这种“窄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题材上,容易被窄化为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或英雄人物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往往限定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这种窄化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主旋律”应有的面貌,也束缚创作者的手脚,我们应该从这一认识误区中走出来,让“主旋律”创作恢复活力。

“主旋律”被窄化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创作原因。“主旋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彼时“八五新潮”后先锋艺术的探索较多,逐渐偏离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与此同时,娱乐产品开始出现,影视的娱乐功能和消费功能被片面突显。“主旋律”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这两种现象,是一种总体上的文艺导向。在那之后,“主旋律”逐渐成为某种艺术类型的代称,即以特定的形式表达某一主题,这导致主旋律创作在艺术上创新活力不足,在市场化文艺环境中往往给人僵化、保守、落后的印象。

实际上,“主旋律”本身是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如果我们在真善美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主旋律,我们的创作空间其实是无限丰富宽广的。真善美是文艺永恒的主题,这是文艺创作常识,对此似乎无需更多思考。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其背后则蕴含着复杂深刻的历史、美学问题。以“美”为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便充满美学冲突,西方美学挟船坚炮利之势强烈冲击传统中国美学,即使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要描写主人公孙少平长得漂亮,还要说他“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在这种美学无意识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时代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清新刚健的人民文艺占据文艺界主流,但伴随时代发展“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种精英化的、西方化的、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逐渐成为“正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今天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